



罗德学者 JT Flowers 谈到在 Albina 长大、篮球、在耶鲁找到着重点

上个月，JaVaughn “JT” Flowers 成为获得 2018 年罗德奖学金的 32 位美国人之一——这是国家最负盛名的学术奖项之一。24 岁的 Flowers 在波特兰的 Albina 邻区出生和长大，并作为语言沉浸项目的一份子而参加了 Lincoln 高中。上个星期，即将在明年秋天前往英格兰牛津大学深造两年的 Flowers，坐在 911 联邦大厦的大厅里接受采访——他在那里的美国众议员 Earl Blumenauer 的办公室工作。

你从哪里以及如何得知你获得了罗德奖学金？

事情是这样进行的，当所有决赛选手都完成了面试后，他们当场立即宣布结果。基本上是，评委们走进一个房间——面试在西雅图举行——把 16 名入围者排列成行，7 名（评委）走了进来，说了几句话，然后按字母顺序宣布了两位获奖者的名字。就是这样而已。

你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我是第一个。我很震惊。根据对我面试的自我感觉以及所有其他决赛选手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我已经完全放弃了我会获胜的想法。在为期两天的面试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来真正了解我的“竞争对手”。我不觉得我有获胜的任何可能性。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反应吗？

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抑制不住哭了起来。我不记得我是否说了什么。我处于完全和绝对不相信的状态。我无法控制情绪，哭了大概 10 分钟，直到他们试图问我关于我的感受的问题，我甚至不能说话，甚至无法表达一句可以理解的短语或言辞。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置了。

你是今年的 10 位非洲裔美国人罗德学者之一，这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这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鉴于选拔的进行过程，这特别令人鼓舞的。32 位来自遍及全美 16 个地区的学者被选中。在每个地区，有 16 名决赛选手，并只有 2 名被选出。他们由完全独立的委员会选拔出来，这些委员会彼此之间并没有沟通，因此这一层次的代表能够通过这样流程而显现出来，表明了这个奖学金真的开始意识到为历史边缘化或代表不足的那些人提供这些机会的重要性。

你是来自 Albina 的孩子。你已看到你的邻区变化了不少。你能谈谈你现在看到的和你小时候记得的有什么不同吗？

我在北部、东北部波特兰的中产阶级化高峰期长大。当我在 1993 年出生时，我的邻居约 69%为黑人，一套房屋的平均价格是在 4.5 万到 5 万美元之间。在 2010 年，我的邻居约 65%为白人，一套房屋的平均价格是 45 万至 50 万美元。这是发生在我人生中的转变。我当时在波特兰经历了这一切。

这真是有趣。当我离开家的有些时候，我反思我的童年，我感觉好像我当时想像了一些我将要经历的事情。然后有些时候，当我在这个过分中产阶级化的社区里散步时，我感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熟悉感—令人不安。这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彻底答案，但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你是 Lincoln 的一名明星篮球运动员，你从新生开始就是州常规赛的球员。当时篮球在你生活中占据多少焦点？

出身于我这样的背景，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出路。篮球对于居住在北部和东北波特兰的那些人来说，特别像一根能够使它们摆脱所处环境的绳索。它耗竭我的身份和个性的每个方面。它消耗我所有的时间。我每周有三或四次都在早上五点半起床，乘 6 路公交车，越过河边，在早上开学之前联系射门 500 次。我会在 12 到 12:40 的午餐时间去健身房，让我的一个朋友把球反弹给我，然后我来投篮。我会在放学后和训练前，留下来健身。从太阳升起来到太阳落山。

那么你有想象自己参加 NBA？

是的，那是我当时的梦想。我当时一直都抱着那个梦想。

你的注意力如何从篮球转向学术？

在高二的一开始，我的脚踝受了伤，大大减少了我的爆发力和运动能力。而且我返回赛场太早了，加重了伤病，使我变成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一名运动员。

我还决定在高二和高三的暑假之间更换 AAU 队，从招募的角度来讲，这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夏季。我的想法是，我想去一所更大的学校。我想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或者南加州（USC）大学，如果我继续在波特兰打球，那些教练不会出席我的比赛。于是我转到了洛杉矶一个名为 Double Pump 的球队。这里更有竞争力，我从波特兰球队中的最好球员变成了球队中的第四或第五名球员。这意味着虽然有更多的高级教练关注我的比赛，但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充角色的球员，而不是一个有潜力拯救比赛的球员。

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受伤和碰运气成为明星的决定—最终彻底削弱了我的录取能力。很多学校都取消了他们的录取书。

你最终进入了耶鲁（在经过重新修课和在寄宿学校渡过一年时间的漫长过程后）。耶鲁是如何进入你的视线的？

耶鲁大学有一位助理教练 Matthew Kingsley，他打电话给我。我甚至不知道耶鲁在哪里。我听过这个名字，但甚至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上学不只是一个你为今后 4 年作出的决定。它是关于你的下一个 40 年的决定。”这是一个很棒的录取推销。

你多快就了解到了耶鲁大学享有多大的声望？

我一挂断电话就马上用 Google 搜索了一下。我完全对之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都不知道我会有任何可能性进入这样的学校。

你在耶鲁只打了一年篮球就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术上了。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篮球一直是我的解脱，是一种抚慰我的压力和解压的方式，一种在我成长的混乱中得到救赎的方式。当我上大学后，篮球感觉更像是压力的源泉。我已放弃了我打算在 NBA 打球的想法，我知道那个梦想已离我远去。所以篮球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终结的游戏，这促使我开始思考一旦我离开赛场后，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我意识到我对任何与体育无关的选择都完全没有准备。

我开始批判性地反思我的童年，以及为什么我在成长过程中觉得我只有一个出路的系统性原因。这使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我意识到，我的情况以及许多我的朋友和家人一辈子的生活环境，都是决策者和政府机构非常有意识的决策的产物。那些决定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和轨迹。所以，如果我想充当一个角色，以为与我有类似出身背景的人们提供获得机会的途径，那么我就必须了解通过什么结构才能将这些机会赋予人们。

在你的 Facebook 页面上，你写下了你生活中有一段时间，你设想离开波特兰并且永远不会回来。这是怎么变化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转变，而我并没有期待这一转变。一旦我离开这里，我特别高兴，而且我觉得我邻里和社区里的每个人都为我感到高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的母亲，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觉得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她的儿子从出生的环境中解救出来。

我想很多来自类似于我社区的人们都把这个地方看作一个扼杀机会的城市，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一看法。但是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在耶鲁大学资助下进行国际旅行—因为我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我认识到波特兰存在的问题是波特兰特有的，但是它们在全世界都存在并都有所呈现。

我对国际事务和难民权利以及西欧难民青年获得机会的途径非常感兴趣，我的一些朋友促使我开始思考我与这个话题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他们说，嘿，如果你发现与这个话题中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那么你应该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在哪里直接参与并通过某种类型的转型变革而与此产生有意义的利害关系。唯一的答案是我的家乡—波特兰。

-Mike Tokito